

导 言

阿沙夫·拉辛 埃弗瑞·萨德卡
(Assaf Razin and Efraim Sadka)

在过去的 20 年里，人们可看到一个走向经济开放的日益明显的趋势。独立的经济体系——地区、州、国家及其他经济实体之间边界的消失对每一个体系的经济政策均具有重要的含义。资本、企业及劳动力现在可以跨地区、州及国家而自由地流动，并且充分地利用不同的机会（如就业、储蓄与投资等）技术与经济环境以及不同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例如，税基已日益变成全球性的，并且其在各税收区间的配置对各地区的税收政策作出更为敏感的反应。正如《经济学家》（1997 年 5 月 31 日）简洁地指出的：

“全球化是一个税收问题。理由有三点：首先，厂商更自由地在各地

投资设厂……这将会使一个国家无法比其竞争者征收更高的税收……第二，全球化企业难以决定它应当在哪里去纳税——不论其以何处为经营基地 这赋予它们[公司]更大的空间去围绕或利用狡猾的调拨价格或转移经营去减少税赋账单……第三，全球化减少了个人纳税的边界 由于技能的职业工人比 20 年前具有更大的流动性，这使得向个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变得愈发困难。'[第 17—18 页]

同样，资本可由报酬低且劳动成本高的地方流向其他报酬高而劳动成本低的地方。此外，实际汇率错调影响了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对资本、劳动及其他投入的可利用程度，因而也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国际配置。这类错调时常由跨国差异货币政策引致，后者诱致了短期的利率差价与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

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的跨国扩散。技能工人的国际化流动、商品与服务的国际交易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均为技术国际化流动的重要工具。这使技术创新的全球性价值、世界价值高于国家性的价值——其自身的价值又显著高于发展该创新的公司的报酬。因此存在技术创新的两级效应——日益增加的全球化扩大了其第一级的效应。

1. 技术的国际流动性

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对近期被激烈辩论的问题——发展中与发达经济间的人均产出的趋同问题有重要的启示。这个问题首先由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1988)在他关于内生增长的研究中引发。他认为，国家间人均收入的水平与增长率的差别是经济发展产生的问题。一方面，较之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更迅速地进行资本积累，这缩小了人均收入的缺口。另一方面，如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所观察到的，研究与发展(R&D)支出具有极高的报酬率，并已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工业国家。如果 R&D 支出不产生显著的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那么这些支出将倾向于扩大收入缺口。

这个问题促使赫尔普曼提出 R&D 收益的国际分配是否像支出一样具有不对称性，或是否 R&D 支出的显著的国际扩散效应引致了该利益的国际分配具有更大的扩散性。这种扩散可缓解 R&D 扩大收入差距的效应。在第一章中，赫尔普曼尝试性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R&D 扩散效应是重要的，并且存在着由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的显著的跨国相关性。由于对外贸易与投资在其他许多方面是重要的，由 R&D 所推动的国际生产力的联系使它们变得更为重要。

2. 资本流动与汇率错调

今天，随着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的国际一体化，人们时常会遭遇汇率对其长期稳定水平的显著偏离，这些现象被称为汇率错调。在第 3 章里，奥法尔·拉辛与苏珊·柯林斯(Ofair Razin and Susan Collins)构建了一个实际汇率错调指数，用于对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开放经济模型做随机性的解释。弗伦克尔、拉辛与袁(音译)(Frenkel, Razin and Yuen 1996)。该模型允许完全的价格弹性与局部的价格弹性，错调用价格刚性条件下的实际汇率水平偏离完全价格弹性下的均衡的实际汇率水平的程度来定义。

典型地 在一个较大的经济中 急剧的财政扩张将会对本国利率产生向上的拉力，并且会把资本从世界其他地方吸引到本国。正如鲁德杰·多恩布什 (Rudiger Dornbusch 1976) 所强调的，工资与价格刚性引致了过度的汇率错调。这便是 1981 年美国财政扩展的效应——它引发了美元的显著的过高估计。在观察这个与其他类似的情况时，汉斯-维尔纳·辛在第 2 章中对德国统一的全球效应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为了把东德工人的收入水平几乎同时提高到与其西德的伙伴同样的水平 巨大的东-西德之间的转移支付发生了 从而引致了巨大的财政扩张 在 1991 年，主要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创记录地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1%。欧洲资本与其他资本流入德国，并且德国马克过度升值。由于欧洲货币体系 (EMS) 的僵化的货币安排，其他欧洲货币跟从这种变动，就累积成 1992 年 EMS 的危机——当时一些 EMS 国家 英国与意大利 退出 且允许其货币向下调整 而其他一些国家 西班牙、葡萄牙与爱尔兰 在 EMS 规定的范围内作出了类似的反应。辛 (Sinn) 试图去决定欧洲货币在 1999 年被永久性地冻结在马斯赫特货币联盟内之前，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变动。

第 3 章里，拉辛与柯林斯进一步经验性地考察了实际汇率错调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他们提出的证据是这种效应并不对称 即过高估值有害于增长 但过低估值并不会与增长有密切关联。

3. 税收激励与资本流动的方式

在近几十年里，世界资本市场发生的一些重要的变化是

间接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日益增加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 (MNEs) 的成长。除了税收 (如关税) 对贸易的明显影响外, 资本流动与货物贸易的方式还受到直接税 (对资本与劳动力征税) 的影响。

开放经济中税收的效率在传统上被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涉及广义定义的生产效率——这个概念不仅指本国生产的投入配置的标准效率, 而且也指本国与外国之间 (通过国际贸易) 的生产的有效的暂时与跨期配置。第二类涉及消费者对其消费束的支付意愿与其生产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匹配性。人们可能理想地希望获得这两种效率, 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 扭曲性税收不可避免。现代公共财政文献仍强调生产效率比消费效率更重要 (见戴蒙德与莫里斯 Diamond and Mirrless 1971)。

生产效率要求一个经济采纳居住地纳税原则 (弗伦克尔、拉辛与萨德卡 Frenkel, Razin and Sadka 1991)。该原理阐明, 纳税人的居住地是估价税收负担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居民的世界性收入可被统一地征税, 不论其收入的来源如何 (国内或国外)。同样地, 一个国家不能对非居民的收入——在该国获得的收入征税。这样, 本国的资本的边际报酬等于资本的世界报酬率, 从而确保国家资本存量的价值最大化 (非居民不被征税, 假设他们在其居住国接受了一个完全的税收优惠, 则生产效率仍可被保证。)

但是, 存在一种国际资本市场失效的情形——它们可要求偏离居住地原则。在第 4 章 阿沙夫·拉辛、埃弗瑞·萨德

卡与袁智旺(音译)(Assaf Razin, Efraim Sadka and Chi-Wa Yuen)研究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三种主要工具:资产组合中的流量、资产组合中的股票流量及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由于本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如本国投资者的本地优势)各种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是次优的,这便需要对各种资本流动的税收待遇问题作出全新的透视,以便提供校正市场失灵的适当的投资激励。特别地,依靠资本流动的类型,用不同于居住地原则的方式对这些资本流动提供补贴或征税将会更有效率。

一个十分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MNEs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公共财政方面——在整个有关 MNEs 的文献中被广泛研究的问题是转移价格问题。典型地,这些研究关注于转移定价在将利润由高税收区转入低税收区中所起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标准的假设是 MNEs 不仅决定其子公司之间交易的转移价格,而且也决定其子公司在所在国市场出售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在第 5 章,古特姆·施杰德鲁普(Guttorm Schjelderup)与劳尔斯·索加德(Lars Sjørgard)注意到,在许多情形中,MNE 只决定转移价格,而子公司所在国市场所出售的最终产品定价则被授权由子公司处理。此外,他们假设,子公司并没有行使完全的垄断,相反,它只与所在国竞争者进行策略性的互动。他们揭示,由于转移定价政策通常影响子公司的战略行为,MNEs 不再依靠转移价格将利润由高税率区转向低税率区。相反,MNE 转移定价政策可能减少 MNE 的总利

润。因此 施杰德鲁普与索加德表明 出于税收节约动机而使用转移定价的激励被减少。

4. 联邦体系中的收入再分配的限制

一个经济联盟中有两个层次的政府：一个是超国家的政府，一个是众多的国家性政府。政府中类似的二层次结构在联邦中同样存在：一个中央 联邦 政府及众多的州政府。同这种双层次的结构相平行，存在两个层次的社会保险与收入再分配机构：州际与州内保险与再分配。当依照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并非所有的联邦成员是平等的时候 以及 或者 当成员州内的个人依据这种特征是不平等的时候，典型地会出现收入再分配问题。即使在事前所有州是相同的，并且州内的所有个人相同 假设他们 州与个人 面临的风险不完全相关 仍会出现社会保险问题 因此需要进行风险分担。

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政府（中央政府及众多的地方政府）的经济联盟中 传统的公共融资做法给中央 联邦 政府分派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例证。首先，要素流动产生了州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如果它们被分派了再分配的作用 则经常会由于“日益消失的纳税人”等现象而导致次优的再分配。第二 在劳动力不可流动时 只有联邦政府可进行跨州的收入再分配 这个作用相当重要。在第 6 章里，为集中分析中央政府的跨州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赫尔穆斯·克雷默与皮埃尔·佩斯提约（Helmuth Cremer and Pierre Pestieau）由假设要素不可流动而概括了税收竞争问题。他们也假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些信息不对称，实

际上，这只是允许州政府在其居民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联邦政府只能观察到每个州的总的再分配的努力（如用其总的年税收度量）并把它的跨州再分配政策建立在这个变量的基础上。因此，中央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削弱了相对富有的州政府在其居民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激励，因为参与这类再分配的州政府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惩罚”。这造成了州际与州内收入再分配的替代。虽然中央政府最优的激励——兼容再分配典型地减少相对富有的州的内部收入再分配，克瑞默与佩斯提约又表明该政策对相对贫困的州的影响并不清楚：不充分的再分配与过度的（内部）再分配均可能出现。

引致资本跨边界流动的全球化分担不规则的产出冲击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国内总产值（GDP）冲击不再被充分地传递进国民总产值（GNP）冲击中。因为本国消费更密切地与 GNP 而非 GDP 相联系，同样地，GDP 冲击很可能不会充分地传递给消费。阿斯祖伯利、索荣森及约沙（Asdrubali, Sorensen and Yosha 1996）已发现，风险分担的这条途径，如资本的跨国界所有权，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美国已显著地提高对州产出冲击的 27%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资本市场吸收，在 80 年代这个数字上升到 48%。萨拉-马丁与萨克斯（Sala-i-Martin and Sachs 1992）已指出，在联邦体系内，累进税转移支付体系对风险分担作出了贡献。在第 7 章里，本特·索荣森与奥维德·约沙依靠度量各种联邦保险机制（如失业保险、老年社会保险等）对不规则产出风险的跨州分担所作出的贡献来推进这种考察。他们检查了州产出与其得到的

联邦净转移支付的负相关程度。他们发现了联邦社会保险在美国的跨州风险分担中的显著作用。在这些各种形式的保险中，失业投保费以及收益金被认为是最经济有效的。他们由此结论得出的教训是——这也适合于欧盟（EU）对一个与 EU 规模相当的保险体系而言 以一个相对小的预算条件 欧盟可在其成员国之间取得显著的风险分担。

5. 税收协调、税收调整与“日益消失的纳税人”

随着财政与经济活动日益国际一体化，诸如对跨国企业的收入征税，以及本国居民的来源于外国的收入与非居民的来源于所在国的收入的待遇问题日益列入税收政策学者与实践者的议事日程。当国家财政当局之间不存在更密切的合作（如信息的沟通、税率与税基的和谐与协调的条件下 对流动的要素征税会变得更加困难。今天，不仅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可以流动 而且技能工人与职业劳动力 以及非技能劳动力也变得日益具有流动性。在不存在国际合作的条件下，国家的税基可能严重地萎缩。因此，税收体系的全球性与国家性效率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出于这些与其他的理由，维托·坦茨（Vito Tanzi）在第 8 章中提出并讨论了建立世界税收组织的必要性问题。这样一个组织也能处理跨边界的环境性扩散及其他的国际外部性、国家间的税收仲裁 及有关财政问题的技术性援助以及税收会计标准等等。

在第 9 章中 朱利安·阿沃斯（Julian Alworth）详尽说明日益扩展的衍生金融工具（DFIs）给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征税提出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税收组织的例证。他强

调：“将来源基准的总的预扣税应用于众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几乎不可能……以及出于避免在来源地交税的目的，纳税人有可能将应税交易伪装成许多直接对外投资。”世界税收组织可有助于各个国家（通过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实施居住地原则，可能包括一些基于来源基准的征税，以及为外国支付税收提供优惠。”

更为可能的情形是，在一个经济联盟内维持财政分离。例如欧盟以及埃菲拉姆·克莱曼 Ephraim Kleiman 在第 11 章分析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便属于这样的情形。因此，通过某种超国家的组织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如坦茨的世界税收组织便是必要的。按照以色列—巴勒斯坦 1994 年协定，一个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的结合体出现了。一个共同外部关税网把二者联系起来，两个实体间商品与资本可自由流动，不存在边界税收检查点，有时还存在一些人员的有管理的流动。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有必要建立收益分享与结算标准。例如克莱曼在第 11 章所指出的，巴勒斯坦的大部分进口要经过以色列的港口与机场，间接税（如增值税 AVT）与关税由这里的以色列税收当局征收。同样，由于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贸易存在大量的逆差，以色列税收当局对巴勒斯坦人消费的以色列商品征收的增值税收益必将会大于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消费的巴勒斯坦商品所征收的税收收益（给定相关的增值税率），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达成某种一致形式的收益分享和结算的共识。

税收体系的全球性效率与国家性效率问题充斥着国际公

共财政文献。例如，当可以有效征收跨边界税收时，小型的、无市场操纵力国家间的非合作税收竞争的效率可能是次优的（拉辛与萨德卡 1991）。这便是，即使税收自身是扭曲性的，税收政策的协调与和谐化也无法改善效率。国际税收的合作可能加强税收的执行，特别当经济边界（如边界检查点）被撤消，如 1992 年以后的欧盟（EU）更是如此。但当经济大得足以行使一些市场操纵力时，并且它们实际上也是这样行动的情况下，非合作税收竞争是无效率的，它类似于囚徒两难博弈的次优结果。

借助直接贸易税收与补贴进行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操纵，在很久以前已由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 1953—1954）表明是无效的。这种直接的贸易战现在已大体停止，并且已从 EU 及其他自由贸易区完全消失。在第 10 章里，本·洛克伍德（Ben Lockwood）考虑了这样的经济——在其中，政府采用与贸易不相关税收（间接消费税如消费类型的 VAT）以便满足一定的收益要求。作为副产品，这些税也充当贸易战的武器，因为它们影响本国消费与生产的方式，所以也影响了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贸易条件。他揭示如何及在什么环境下，商品税协调（如欧洲委员会 1993 年对最低 VAT 及其税率的指导）可能在所有国家实际或潜在地获得收益的意义上是帕累托改进的（在实际获益者向实际受损者进行一些补偿后）。

6. 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传统的公共财政模型预先假设经济政策是仁慈的政府或社会计划者依照良好定义的标准——如伯格森—萨缪尔森

(Bergson-Samuelson) 社会福利函数, 从最优化过程推导出的。但在实践中, 我们时常发现这类模型在一般意义上解释实际经济政策以及在特定意义上说明税收政策时会失效。例如 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 在最近的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一体化时期 (如理论所说的) 有效的资本所得税率在 EU 国家中显著而一致地下降, 这种基于最优化的政策与实际政策之间的偏离已推动了国际性或跨地区税收竞争的以政治经济学为基准的模型的出现。在这些模型中, 政策或者是游说者与压力集团之间政治平衡的结果, 或者直接是选民间政治平衡的结果 (在直接代议民主中)。

正如早期指出的 (当居民原则不能被执行时 (由于对居民的外国来源的收入征税不能被有效地强制执行)) 基于最优化的税收政策将典型地要求较低的资本所得税。在一定的环境下 (诸如可选择的税基的广泛范围的可利用性) 资本所得税共同地下降。在第 12 章里 安杰斯·豪瑟 (Andreas Haufler) 建立了一种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政治平衡为基础的可替代的税收政策决定模型。当对外国来源的收入进行征税的成本很高时, 资本市场的日益提高的一体化增加了资本征税的效率成本。在一个政治均衡中, 当分配性因素占优于效率因素 结论 资本所得税的日益收敛/消失 将被推翻。当资本市场被一体化时, 工人一般是资本流出的受害者 而资本所有者则是受益者 相反 工人将是资本流入的受益者而资本所有者则是受害者。因此, 资本出口国便改变资本与劳动税的均衡组合, 以便提高资本所得税与降低劳动所得税。在资本进口

国，相反的情况会出现，从而产生了资本所得税率的国际差异。

在第 13 章里，卡勒·佩若尼与吉姆伯利·斯高夫 (Carlo Perroni and Kimberley Scharf) 讨论了在各种政治过程模型中税收竞争对政治均衡税收的影响。例如，他们提出，本国公司与工会的游说有助于解释税收竞争的国家为什么遵从（无效率的）来源原则——这同传统的基于最优化的模型中的预期相反。同样，后一类模型建议协调可加强效率，如避免贸易战，而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均衡中，协调可能是有害的。

7. 技能工人与非技能工人的移民

当存在无摩擦的国际要素流动时，生产要素将会由其边际产品低的地方转移到其边际产品高的地方。因此，当要素流动不受约束时，每种生产要素最终会产生相同的边际产品——不论其在哪里被使用。实际上，当每个地方存在相同的不变规模报酬技术，并且当两种要素——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品处处相等时，这足以保证每种要素自由地流动。即使一般性地要素流动，以及这里更为特定性的移民提高了全球产出及每个地方的人均产出，收益并不会由人人分享。有一些部门——本国与外国的——将会遭受损失。在完善的、非扭曲的再分配机制下，收益将会扩散给所有的人。

但是，在实践中，人们会发现对移民的广泛抵制——无论是在外国（目的地）与本国（来源地），这种抵制可把摩擦引入移民过程，并且减少了全球收益。同样，不完善的信息也会产生移民的障碍。

较之跨越政治边界的劳动力流动，劳动流动性在单个国家的各地区间及联邦的各州间更为普遍。更为重要的，劳动力流动同劳动法、工会主义、失业与社会保障会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第 14 章中 加尔斯·圣—保罗 (Gilles Saint-Paul) 注意到在近期德国与意大利提供了跨区域的移民的重要的例子 (德国的东部—西部间 意大利的南部—北部间) 在这两个例子中 较之其他地区 某个地区 (德国西部与意大利的北部) 在人力资本上更充裕 (高技能工人) 并且在政治上主导了低技能劳动的全国工会。在长期内，通过低技能劳动从穷困地区向富裕地区的流动，以及高技能工人的沿相反方向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趋于使跨地区之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圣—保罗发展了一个模型 在其中 确定低技能劳动的工资的工会实际上由富裕区的内部人控制。如果穷困地区中的低技能劳动的工资被提高到富裕区的水平 那么 穷困地区低技能的失业在短期内跳跃性上升，之后则下降。贫困地区中的这样一种工资剧增因此会增加失业的低技能劳动从穷困地区向富裕地区的流动。这对工会的内部人将是坏消息。同时，这将削弱富裕地区的高技能劳动力向贫困地区移民的激励。这对于富于远见的内部人是好消息。圣—保罗论证说，相对于高技能劳动力 低技能劳动力的移民成本越大 富有地区内部人使低技能劳动力的跨区域的工资均等化的激励将越大。这在经验上是一个可能的假设。

目的国中的移民的就业机会受到目的国关于移民技能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利影响。在 15 章中 南希·曹音译 与奥迪

德·斯塔克 Nancy Chau and Oded Stark 给来源国与目的国雇主之间不对称信息建立了模型，以便研究对移民包括归国移民动态学的含义。在初始阶段 在移民发生前 目的国的雇主不能区分将成为移民的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在这种情形下，一切移民被提供了相同工资——他们平均的边际产品——如在阿克洛夫（Akerlof）的柠檬市场一样（阿克洛夫 1970）（一个类似的机制将出现在第 5 章中），但随着对连续移民流动的日益熟悉，目的国雇主将会观察到已雇用移民的生产力，并且逐渐变得能够识别未来移民的技能水平。提供给未来移民的工资不再是一致的，并且已雇用的移民所接受的工资将逐渐同真实的生产力相匹配。工资结构的这种变动将有三个效应：首先，它们将会加强更富有技能的工人的移民 并打击低技能的工人移民 第二 它们将会加速非技能工人的回国 第三 它们将会加强来源国获得技能的激励。后一种效应可以抵消给来源国带来的人力外流的不利后果。

8. 货币统一的财政方面

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国家性政府明显地只负责财政政策。因此 当存在独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时 特定国家的产出冲击可通过货币与财政调节来稳定，而在货币联盟中国家性政府的稳定化作用只留给了财政政策。在货币联盟中，一个国家性政府所丧失的可利用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的一个途径是使用作为收益来源的铸币税来替代显性税收（菲尔普斯 Phelps 1973，赫尔普曼与萨德卡 Helpman and Sadka 1979）。在第 16 章中 罗尔·比茨玛与朗斯·鲍文伯

格 (Roel Beetsma and Lans Bovenberg 研究货币联盟中货币政策的日益减少的稳定化作用和所产生的财政政策日益增加的稳定化作用 以及它们对中央银行行为、国家财政当局以及其国民福利的含义。他们已揭示最优设计的中央银行——如罗格夫 Rogoff 1985) 提出的 较之社会 它更重视价格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更保守的。其结论是, 这种最优设计一方面降低了通货膨胀, 但另一方面, 它减少了产出与公共支出——因而对福利的净效应为负。福利的下降可由货币联盟成员国之间的转移支付的适当机制来缓解 参见第 8 章)。

9. 结论

本卷中专题的选择并不是试图包容经济与财政一体化的一切问题。但是, 它从一般的经济政策与特定的公共财政角度把许多经济与金融一体化问题结合在一起。以下是一个包括在本卷中的代表性样本: 国际性研究与开发 R&D 扩散, 汇率在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国际税收与资本流动之间的作用, 超国家政府与国家性政府之间再分配作用的划分, 一体化对政治经济学均衡的劳动与资本税的影响, 存在移民时的工会工资确定, 以及货币联盟中财政政策的日益增加的稳定化作用。

参考文献

Akerlof, G.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ative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488—

500.

- Asdrubali, P. , Sørensen, B. E. , and Yosha, O. (1996). Channels of interstate risk sharing: United States 1963–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1:1081–110.
- Diamond, P. A. , and Mirrlees, J. (1971). Optimal taxation and public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8–17, 261–78.
- Dornbusch, R. (1976). Expectation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1161–76.
- Frenkel, J. A. , Razin, A. , and Sadka, E. (1991).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n Integrated Worl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Frenkel, J. A. , Razin, A. , and Yuen, C.-W. (1996), *Fiscal Policies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Helpman, E. , and Sadka, E. (1979). The optimal financing of the government's budget: taxes, bonds or mone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152–60.
- Johnson, H. G. (1953–54). Optimum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2:142–53.
- Lucas, R. A. ,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3–42.
- Phelps, E. S. (1973). Inflation in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5:67–82.
- Razin, A. , and Sadka, E. (1991). Internat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gains from tax harmon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37:69–76.
- Rogoff, K. (1985). The optimal degree of commitment to an intermedi-